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

经济政策述评

杨　声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政策

第一节　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的启示……1
第二节　国外住房政策、管理体制及对我们的启示……13
第三节　香港房地产管理制度……21
第四节　西方价格法规……33
第五节　日本产业结构与就业政策……35
第六节　美国企业改进质量的十点经验……41
第七节　惜才如金的美国贝尔实验室……43
第八节　欧共体关于计算机程序的法律保护的新方针…45
第九节　联邦德国关于商品市场不正当竞争的有关规定……49
第十节　瑞典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51
第十一节　澳大利亚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十项措施…54
第十二节　美国加州执业律师介绍美国产品责任赔偿法……59
第十三节　加拿大两个省的法律关于销售者对所出售的消费品的质量担保责任的规定……62
第十四节　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63
第十五节　一些国家科技法中关于科技经费投入的规定……66

第二部分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第一节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宏观调控机构及其职能……68
第二节　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机构及其职能……73
第三节　韩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81
第四节　日本政府的物价管理……89

第三部分　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第一节　意大利国家参与制企业集团的管理……93
第二节　日本与美国企业管理方法比较……97
第三节　德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造……99
第四节　法国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109
第五节　加拿大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112
第六节　国外企业形态的法律确认和比较……115

第四部分　公司制度

第一节　美国的企业组织形式……119
第二节　英国关于国家独资公司的规定……123
第三节　欧共体关于独股公司的法律指令草案……126
第四节　台湾银行法简介……128
第五节　香港的公司立法……132
第六节　西方主要国家及港台地区公司法的基本内容……140
第七节　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有限责任公司司法的主要内容……155
第八节　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和监察人的法律规定……157
第九节　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合并、解散和清算的法律规定……160
第十节　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法律规定……161

第五部分　股份制与证券管理

第一节　台湾法律关于证券市场的规定……168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制经济……173
第三节　美国债券市场的运作……177
第四节　美国的职工股份所有制……187
第五节　日本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88
第六节　日本企业内部的职工持股制度……194
第七节　瑞士股票案例……201

第六部分　农业发展政策

第一节　欧共体农产品价格政策的特征……204
第二节　政府在保障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210
第三节　各国政府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几个重要方面……214
第四节　一些国家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情况……219
第五节　美国农业的投入和产出……225
第六节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229
第七节　美国的农业服务体系及其特点……235
第八节　欧洲农业共同政策的改革趋向……240
第九节　国外农产品流通改革的一些做法……244

第七部分　税收制度

第一节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关于对逃避纳税嫌疑人财产实施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253
第二节　西方五国和我国台湾关于对欠税人财产强制处分征税的法律规定……254
第三节　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查询纳税人银行账户的法律规定……257
第四节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违反税法行为的处罚规定……259
第五节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关于欠缴税款的处理和违反税收法律行为的处罚规定……263
第六节　法国关于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268
第七节　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纳税人离境管理的法律规定……26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政策

第一节　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的启示

60年代以来，继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亚太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先是“四小龙”，接着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紧紧跟上，造成了亚太地区一浪接一浪的工业化浪潮，使西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的经验，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是有益的。

一、抓住有利自身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亚洲新兴工业化群体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发达国家的重大经济转变，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国际性剩余资本的转移流动，以及发达国家间的竞争与摩擦，都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把握机会，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机遇。

30年来，从宏观上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至少抓住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

60—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由进口替代型经济转向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起飞期。世界经济在战后复苏的基础上，从50年代开始进入了现代经济史上最长的持续增长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美国和西欧国家随着工人工资的提升、通货膨胀的出现，开始转移和淘汰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产业，并向海外开放市场，向海外投资，形成战后第一次全球性的海外投资浪潮。这对苦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没有取得经济自主预期成果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无疑提供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天赐良机。在日本“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之后，60年代初，韩国、台湾、新加坡都展开了发展战略的大辩论。韩国果断地修改了原定从1962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口替代”战略，确定实行“以出养进”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并在1961年两次修改《外资引进促

进法》，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轻纺工业。台湾当局于1960年9月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对外来投资给予种种优惠政策。整个60年代，世界贸易总量每年增长8%，“四小龙”依靠世界市场，利用劳动力优势，使加工工业形成了规模经济。台湾地区60年代的进出口增长率高达33.2%和41.5%。韩国引进外资25.74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5%。台湾创造了雨伞、鞋帽、毛衣、自行车等20多项产品外销量居世界第一的“奇迹”；香港电子表、玩具等的外销也都位居世界之首；韩国的轻纺工业更以25%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在五六十年代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浪潮中，亚太地区最先和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而亚洲“四小龙”不失时机地在60年代跟了上来，也从中受益，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70—8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打击，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进入了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对轻纺产品进口采取了限制政策，国际经济环境对实行外向型经济而又缺乏石油资源的亚洲“四小龙”是不利的。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发展高技术集约型经济，而将一部分成本较高的粗放型重化工业向外转移，产生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浪潮。亚洲“四小龙”又一次迅速地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韩国把1972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设重化工业上，提出重点发展钢铁、造船、机械、电子、石化、有色金属等6大战略产业，建立了多处重工业基地，以后又将6大产业扩大到10大产业。台湾加工出口型轻工业在60年代迅速扩张，积累了大量资本，70年代初开始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先后提出了“十大”和“十二大”建设项目，大力发展石化、钢

铁、造船工业等。与此同时，台湾还大搞基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四小龙”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转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国际分工效益。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迅速增长。韩国1977年出口突破100亿美元，1981年达到200亿美元，重化工业产品超过出口总额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21.2亿美元增至1979年的610.6亿美元，增长28.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

8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战后第三次投资高潮，不失时机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口号，使经济发展又迈上一个新台阶。80年代，美、加、欧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市场需求较弱，加之美日经济竞争加剧，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剩余资金转向劳动成本较低、能够产生更高利润回报的亚太地区。1980年美国对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为83.97亿美元，到1986年增加到160.21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不振、贸易萎缩的情况下，日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美国一再压日元升值，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受到很大打击。日本政府被迫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使“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发展，鼓励私人企业向海外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海外。同时，日本为迈入世界政治大国，提出了“资金还流计划”，这又一次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吸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日本对美国以外的亚太地区投资从80年代初累计92亿美元，上升到1984年的179.9亿美元。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充分的外来投资紧紧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使电子电器、通讯、汽车制造等行业迅速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产品结构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984年，台湾、新加坡、韩国进入了电子电器、计算机生产出口国的世界前10名。电子工业变成了香港的第二大出口产业。

对同处亚太地区的东盟国家来说，亚洲“四小龙”的机遇和发展也是它们的机遇和发展。虽然他们的起点比“四小龙”低，但这恰好与处于亚太经济龙头的美国、日本以及处于中间发展层次的“四小龙”，形成了一种梯级发展的分式。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称之为“雁行式”经济发展。

由于东盟国家紧紧抓住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不仅美、日等发达国家向东盟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力求使产业结构升级的“四小龙”也都纷纷在东盟国家投资办厂，产生了积极的产业转移和资金转移的传递效应，使东盟国家享受到了“后来者利益”。1988年以来，泰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1989年的9%，上升到1990年的10%。被称为“东南亚最后开拓地”的印度尼西亚，也走上了外向型工业化的道路。东盟国家已被列入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机遇是不可逆的。同样的机遇只有一次，稍纵即逝。60、70年代两次大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本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同样的有利机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坐失了良机，而50年代与我国经济水平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坐享其利，与我们拉开了距离。80年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显著的成就，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赶上了第三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90年代亚

太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必须以更主动、更积极的态度再一次把握历史机遇，争取中国经济新的腾飞。

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参加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把握发展机遇

回顾近3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人们会发现，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同样的发展机遇面前，有的能够反应敏锐，及时把握，有的则信息迟钝，错失良机。

50年代，亚洲“四小龙”与印度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都曾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这些国家都期望通过逐步建立独立工业体系，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但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替代”战略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台湾地区和韩国国内的轻纺工业市场已经饱和，而发展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又资金不足。由于美援的停止，输血经济已难维持。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韩国和台湾在战略上选择继续发展轻纺工业，向海外扩张市场，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尽管这次转向一开始带有被动的性质，然而恰恰赶上了60年代国际市场繁荣和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好时机，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印度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完成轻纺工业的进口替代后，没有采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转向搞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结果未能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把握发展时机，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就可比度更大的东盟国家内部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马来西亚、泰国的发展要比拥有石油资源的印度尼西亚快，重要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因之一就在于马来西亚和泰国较好地将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变为能够保持中长期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结构。而印度尼西亚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过于依赖它得天独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建立以此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府财政的40%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的税收，未能建立起多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果在80年代初石油价格普遍下跌的冲击下，发展反而迟缓。虽然这种状况后来有了转变，印尼政府下决心调整了产业结构，现在非石油产品的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错过机遇，慢了一步。

1987年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将41个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战略上分成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类型国家。经过对这两类国家在制造业、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工业增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工业中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中就业人数的增长等进行综合性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各方面的数据均优于内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

同样的国际机遇，为什么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就容易抓住，而内向型经济的国家却常常失之交臂呢？道理十分简单。外向型经济自身的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更深入地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参加到世界经济的循环中去，处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动荡之中，风险大，机会也多。外向型经济要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机会，获得发展，因而它信息灵，反馈快，能够迅速准确地把握有利自身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根据市场取向，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并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效益。

大的历史性机遇自不必说，就是一些小的机遇，也只有实行外向型经济，才能及时、灵活地作出反应。亚洲“四小

龙”在发展过程中，就曾多次不失时机地抓住国际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作出有利自身发展的调整。例如1985年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日经济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行，本来这对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但是亚洲“四小龙”却充分利用国际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下跌，国际利率下跌，以及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后日本货物价格上升的机会，成功地打入美国市场，对美日出口商品的增幅达到每年30%左右，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形成了所谓“三低一高”情况，带来了“一花独秀”的局面。

实行外向型经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关键在于不能动摇。韩国的经济在经过从1973年—1979年的持续跃进之后，70年代末，各种比例严重失调；世界性经济衰退，使韩国多年积累的矛盾爆发出来，引发了经济危机。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4.8%的负增长，通货膨胀率高达28.7%。韩国当局在提出“稳定、效率、均衡”总方针，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调整的同时，并没有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在债务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由28%激增到45%的情况下，仍大量、持续地引进国外资本，使经济迅速得到恢复。1981—1982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1983—1984年经济增长率又恢复到10.2%的高速度，进出口贸易突破600亿美元的大关。1983年韩国新欠外债高达468亿美元，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1986年开始就以每年几十亿美元的速度偿还，到1989年竟一跃成了债权国。

而这一时期，拉丁美洲许多债务沉重的国家，单纯采取收缩政策，尽管通过压缩进口、削减投资，使外贸结算在1982年扭亏为盈，但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后劲，未能赶上1983年全球经济恢复的机遇。

两种发展类型的比较研究充分证明，开放程度越大，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深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与发展，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把它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才能抓住机遇，持续发展。

三、选择正确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把自身有利条件与国际机遇相结合

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本来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辩证地看，正因为后起，可以对国际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将自己的优势与国际环境中的有利条件相结合，确定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合理位置，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最佳配置。国际经济发展的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比较利益不能只作静态的考察。一国的比较利益格局往往随着一定条件的变化而转移。比较利益的转移，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会，它往往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顺应这种转移，就能取得主动。亚洲“四小龙”发展初期具有劳动力丰富、便宜的优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为劳动密集产业注入科技因素，自动化机械和机器人的大量使用，这个优势一步步地丧失了。1973年韩国每小时的工资为0.28美元，到1982年就上升到1.42美元，整整涨了4倍。对此，亚洲“四小龙”敏感地审时度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东盟国家去，而大力发展新技术产业，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调动起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来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互间要避免经济

发展撞车，也要注意在共同优势中找出自己的特殊利益，独辟蹊径，独立发展。在这方面，新加坡的成功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在60年代已经成功地抓住产业调整的机会，由一个资源贫乏的转口商港，变成了一个加工工业十分发达的半工业化国家，进而在70年代又建立起以造船、电子和炼油为三大支柱的新兴产业，跨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8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规划进一步发展时，对自己的比较优势重新进行了定位，认识到自己国度小，人口不过270万，缺乏独立的科学开发能力，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上很难与韩国和台湾竞争。但是作为处于交通要道的良好港口城市，新加坡教育程度高，环境优美，社会稳定，城市建设、通讯和各种服务设施齐全，具有发展第三产业的优势，而这正是当今世界产业调整的又一新潮流。新加坡把自身优势与国际机遇相结合，进一步作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提出重点发展国际金融服务业、国际通讯服务业和国际贸易服务业的新方向，使其成为“亚洲的瑞士”。

新加坡的航空业本来就很发达，为对付激烈的国际竞争，它拿出相当国土面积2%的662公顷土地用来建新机场，使航空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型航空公司，与58个国家和地区订有航空协议，每周有2450次航班飞往5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个城市。去年在新加坡机场抵离旅客总数为1630万人次，使新加坡成为亚洲的航空中心。

发达的交通促使了旅游业的迅速发展。1985年到新加坡的外国游客突破300万人次，1988年突破400万人次，1990年突破500万人次。1991年在世界旅游业因海湾战争而不景气的情况下，新加坡仍接待了541万游客，创外汇收入54亿美元，成为国家收入的第三大来源。1990年新加坡主办国际

会议2768次，仅会议展览一项，就为新加坡带来7.6亿美元的收入。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机遇是客观的，能不能把握它，取决于主观的努力和正确的决策。同时，机遇又是相对的，对彼有利的，对已不一定有利；对彼不利的，对已不一定不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把机遇这一外部条件与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20%的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发展条件和特点，必然有自己独立的比较利益。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世界经济形成互补性，并从国际分工中获利，这是需要认真思索的。简单地模仿别人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成功之途。

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拢、创造机遇、不断扩展自己的经济生存空间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十分激烈，经济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对后起国家来说，国际经济与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没有摆脱衰退的阴影，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机遇也有挑战和风险。要为自己争得发展的机会，就要敢试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挤进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机遇，有五六十年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着意加以扶植的因素，但是更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它们已经成为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的不可轻视的对手，它们所获得的发展机遇，

主要是在经济大国的兴衰交替和国际竞争与协调中纵横捭阖，多方寻找、利用和扩大间隙，为自己争得的。

韩国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显然与实行同一经济战略，技术和金融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发生利益冲突。韩国经济持续发展，与日本的差距日趋缩小，成为“第二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日本的冲突也就越来越明显。如在造船、钢铁、轻工等领域，韩国直追日本，一再撞车。韩国虽从1975年才开始生产彩色电视机，但仅用8年的时间，产量就由4.7万台增加到371万台，年出口达120万台，对日本在美国的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韩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本非常担心这种“飞来器”效应，因而对技术转移越来越保守，不断加高“技术转移壁垒”和“贸易壁垒”，使日韩贸易出现长期赤字。而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日高。近年来，美国不仅取消了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普惠制，甚至搬出“301条款”的大棒来对付它们的倾销政策，单纯依靠对美欧贸易的顺差来弥补对日贸易的赤字也日益困难。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竞争中，韩国清楚地意识到，它历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削价倾销的出口增长战略已举步维艰。为了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韩国一方面努力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进程，将“振兴科技”、“技术立国”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仅在大德研究基地就设立了40多个研究所，敢于同发达国家进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抢占21世纪的制高点，加速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积极与日本进行产业结构协调，努力改善商品出口结构，推动日本按照“比较利益原则”，让出一部分传统产品市场，以免两败俱伤。如在钢铁、造船方面，推动日本主要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特殊钢和高级船舶的生产，而把普通钢铁和船舶的生产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